

周太谷及其《周氏遗书》

方宝川

周太谷是清朝道光以后盛行于江苏、山东、江西等地的一个以儒学为中心，兼采佛、道思想的近代民间学术派别——太谷学派的创始人。太谷学派的学说在我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独具新义，影响颇大。周太谷所撰《周氏遗书》（原名《十三经或问》，周太谷逝世后，由其弟子汇辑校定，改题为《周氏遗书》）是太谷学派的经典著作，它对研究近代思想史的发展，具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遗憾的是，这份珍贵的文献遗产，与太谷学派的其他著述一样，向无刊本，罕为人知。尤其在清同治五年（1866）的山东“黄崖教案”发生后，《周氏遗书》等太谷学派的著述更秘不示外人，仅以抄本形式在学派内部供传道之用。章士钊、卢冀野、范文澜、柳诒徵诸先生生前均十分关注太谷学派的研究，只因文献无征，始终未能充分展开。直至今日，学术界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仍然处在拓荒阶段。^① 笔者根据近年来所知见的有关周太谷及其《周氏遗书》的情况，草此拙文，以供研究者参考。

一、周太谷及其太谷弟子

周太谷名穀，字星垣，号太谷，别号崆峒（一作空同）子。安徽池州府石埭人。其确切的出生年月，目前尚难考定。学派的第三代传人黄葆年说：“太谷生于乾隆”。^② 但究竟生于乾隆何

年？则不得而知。据太谷传人之一张积中的《〈十三经或问〉告成祭文》说：周太谷著书“始于辛巳”（清道光元年，1821）^③。而周太谷在《周氏遗书》中曾自言：“予未三十而恶穷居，未四十始知不好学也，今也未五十，其心始无恶焉”。“未五十”即近五十岁。若周太谷著《周氏遗书》时，年近五十岁，那么由道光元年（1821）上推48—50年，太谷则约生于乾隆三十六年至三十八年（1771—1773）间，这与黄葆年的说法是基本相符的。

周太谷“少好神仙，喜游历，蚤孤”。二十多岁时，因“恶穷居”，“母太夫人尽以国财付之，恣其所之”。所到之处，“求师访道，足迹遍海内”。（均见谢逢源《龙川夫子年谱》）初师福州韩子俞（字仰瑜），学老氏之学；从南昌陈少华（字一泉），受佛氏之教。清嘉庆丙辰年（1796），“道经匡庐，见石镌茂叔志伊尹之志，学颜渊之学语，始检孟子之仁义，子思之诚明，曾子之明德，颜子之博约。反复观思，了无所得”。^④嘉庆戊午年（1798），“续游匡庐，复检仲尼己立立人，已达达人，能近取譬语，熟观沈思，豁有所得。忆孟、思、曾、颜之学，其义一也”。^⑤从此遂悟至道，归根儒学。周太谷明道后，陈、韩二人“自知弗如，复从而受业焉。”（《龙川夫子年谱》）传说太谷至诚如神，且能“炼气辟穀，通阴阳奇駭，符图罡咒，役鬼隐形”，^⑥时人多以术士目之，当地的地方官则恶而收系之。太谷出狱后，曾隐居江湖多时。大约于道光元年，移居扬州，寓海島巷。经过多年的生活和传道实践后，“为《或问》十三篇，皆九经、四子不显传之秘，而圣学以明”。（《龙川夫子年谱》）又因“传道不拘守形式，时以医治人疾”。师徒间则定期举行一些带有宗教色彩的“俎豆”礼仪，所以吸引了不少的从学者，逐渐形成了一个民间的学术团体。太谷取义《周易·蒙卦》：“蒙以养正，圣功也，”称门人为“圣功弟子”。由于其弟子未列名籍，多不可考。有文献可征的太谷弟子除了陈一泉和韩仰瑜二人外，尚有汪全泰（字

竹海，号子纯，又号铁孟居士）、汪全德（字竹素，全泰之胞弟，人称兄弟二人为大、小竹）、潘小江（名宗艺）、许鹤汀、张积中（字石琴，号子中，又号白石山人，人称黄崖夫子）、李光炘（字晴峰，一字平山，号子炘，又号群玉山人，晚号龙川老人）、汪容甫、周少谷（太谷子）、李倩（字丹崖，李光炘之父）、李和卿（李光炘的族兄）、李南园（李光炘的胞弟）、张寄琴（张积中的胞兄、名积功）、赵孟山、黄列山、廖听桥，以及余子因、寿子含、郑子元、梁子九、子见、子先、子能、贾夫人、宝山人等佚其名者。周太谷收下李光炘和张积中二人后不久，就嘱李将来要“传道于南”，张要“还道于北”。谓李光炘曰：“本铎付汝，凡我生平未发之言，此后听汝说之”。（《龙川夫子年谱》）太谷病革时，又“谓子中曰：‘女事予甫三月，予以周公孔子之道尽告诸尔矣。……《十三经》之任，寄诸尔矣。……予其逝矣，俎豆在庙，其存亡天也，文章在简，予之传其畀尔矣。’”

（张积中《张氏遗书》卷上）由此可见，得太谷衣钵者，惟李光炘和张积中二人。道光十二年（1832）夏四月朔，太谷病卒扬州，李光炘、张积中等奉葬于仪征之青山。

为了实现周太谷的遗愿，张积中于咸丰七年（1857），赴山东讲学，“还道于北”，门徒之众，盖极一时之盛。同治五年（1866），殉黄崖之难，世人扼腕悲叹。李光炘则于同治元年，设教泰州龙川，“传道于南”。“黄崖教案”后，流言四起，李光炘为了避祸，虽时常迁徙，然讲学始终不已。黄葆年、蒋文田、刘鹗、毛庆蕃、乔树枏等一代名贤，一见之下，无不心悦诚服，执贽称弟子。光绪十一年（1885），李光炘终于泰州，享年七十八岁。在李光炘逝世后十七年，黄葆年、蒋文田、刘鹗、毛庆蕃等人合力在苏州创建了归群草堂，共推黄、蒋二人主持讲学传道，其实后来常年寓居归群草堂的实际讲学者则为黄葆年，时人称之为归群先生，弟子为归群弟子。归群草堂极盛时，弟子

近两万人。

二、《周氏遗书》的内容要旨

《周氏遗书》凡十卷，多为语录体的论述。卷一：图原、书原、九畴、易图说、易图说传、卦序、易传上经；卷二：易传下经、说卦说、诸弟子跋；卷三：道原、道由路也说、太谷十三经或问、诸弟子注；卷四至卷十：太谷经传。周太谷认为儒家的十三经中，包含了远取、近取和微言、大义的双重涵义。一是讲“外王之道”，即治国平天下之术；二是讲“内圣之学”，即身心性命之学，其指归不外是“内圣外王”之道。“外王之道”显，“内圣之学”晦，而太谷自己则上承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学，揭示九经四子不显传之秘，阐明群经言内圣之旨。因此，学派中人又称《周氏遗书》为“圣经”。言“圣经”者，内圣之常规也，并无自我推崇之意。

通观《周氏遗书》，语涉玄渺，词句隐晦，颇难索解。但熟读深思，由表及里，亦可窥得其要旨。

首先，全书最主要的部分是关于《周易》的解说和发挥。太谷在《十三经或问序》中就明确指出：“太初之学，传曰包羲，包羲以象传，故画卦；尧以言传，曰允执厥中。知言者，唯舜、唯禹、唯汤；知象者，唯文王。文王序卦序，周公系卦辞，孔子作象辞，孔子亦以言传。”把《易》作为一切学术的源头。而太谷的易学，正如黄葆年所说：“卦言、爻言，皆商周之拟议，汉晋唐宋诸儒欲发其意者，患乎辞之不达也。由孔子以至于太谷，二千五百有余岁矣。太谷以象观辞，以辞观象，合四圣而一之，而《易》始成焉。《易》成而太谷之道成，太谷之道成，而四圣之道俱成。”^⑦是集四圣之大成和发汉晋以降诸儒所未发之言者。例如：《周氏遗书·易图说》曰：“●（读易）之原出于天，包羲氏画之而为卦，至周始系其辞。○（读虚），●（●之

象，心传也，难以名，学者读滴读实皆可）极而○也。○也者，无端之太极也”。其《卦序》又说：“乾，阳气也；坤，阴气也。屯，二气交于下；蒙，二气凝于上也。需讼者，运寒暑也。”所以韩仰瑜说：“读太谷之乾，乃知大赤之气外包，运日星而不坠，曰天。读太谷之坤，乃知深黑之气内孕，载山海而不泄，曰地。读太谷之屯，知坎申之阳，乃大赤之气，下凝而为山陵原黑，旁四断而涵万川。下震一阳为纯赤，二阴为纯黑。赤黑相陶，升而云，降而雨，天地化育，自兹始焉。”^⑧刘蕙孙教授研究认为：周太谷的所谓“○”，是象征大赤之气，“●”是象征深黑之气，“⊙”为阴阳未分化之前。太谷是从《易》图出发，来推论宇宙万物的生成，宇宙是一而非二，是有而非无，是存在而非虚空。^⑨

《周氏遗书》不但把《易》作为推论宇宙万物生成的基础，而且还把《易》看作是人们即物、穷理、修身、尽性的工具之一。是书卷四《进学解·学之节自注》曰：“《易》曰：乾以君之。约性一静，众理贯贯而入焉。渊渊者，静而静之也。《易》曰：艮以止之。博情一动，众理贯贯而出焉。浩浩者，动而动之也。《易》曰：兑以说之。知天德也，知王道也，至圣功也。肫肫者，终性情始性情之谓也。故曰：致中和天地位而万物育也。”在周太谷看来，只要根据《易·系辞》中：“仰则观象于天，俯则取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法则，再通过“耳诚”、“目诚”而“心息相依”的圣功作用，就能达到“寂之不动，感而遂通百脉之故。……居之不动，感而遂通万络之故”的境界（《周氏遗书》卷三）。所以周太谷提出：“儒者知命，可由《易》而知也，次亦可由史而知也。”（卷八）弟子问《易》，则曰：“以《易》而明身命者，未有甚于《易》者也。”（卷三）问修身，则曰：“其始也以《易》洗心，其终也退藏于密而已矣。”（卷二）可见太谷是把《易》作为明道之书的。又因感到

《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所以他的一生“学《易》而已矣。”

（卷十）金天翮的《皖志列传稿·周穀传》说：“太谷之道在《易》，其旁通数术，类皆《易》之支流余系。”的确最为知言。

其次，《周氏遗书》卷三中还有一个著名的命题：“天之赋我曰命，父母赋我曰身，合德曰性。性也者，诚身之大本者。”这就是说：人的生命直接由宇宙而来者谓之“命”，由祖宗而父母而凝聚于本身者谓之“性”，“性”与“命”的合成者谓之身。此是太谷学派“性命说”的根本。刘蕙孙教授解释说：“以性与天命对比言，则○为天命，●为性。故曰：‘命犹日也，性犹晶也’。‘性之主莫大乎命’也。参合‘性’、‘命’、‘身’、‘心’而言，则○为命，●为身为心，●为性。故曰：‘天之赋我曰命，父母赋我曰身，合德曰性’。”^⑩可见，周太谷是把人类生命的起源看作由父母而祖宗而祖宗之父母以至于远始祖之父母，最终又归朴返真到宇宙中的“大赤(○)和“深黑”(●)二气。“●往则○，○来复●，”二气只有聚散，而无消灭。宇宙的原始构成物不灭，由原始构成物而来的人类的性命也就会永恒地存在。但是周太谷的所谓永恒，既不是佛教所宣扬的“涅槃”，也不是道家所追求的“长生”，而是借助于他人的思想忆念作为人类性命永存的形式。周太谷当然知道人的生命要保持永恒不死，是违背自然规律的、不可能达到的。一个人若能在有生之年建立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类的功业，命尽归天之后，为他人所怀念，就是永生于人们的心中，也就是久存于宇宙之间而不灭了。于是，太谷学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希贤、希圣、希天”为主旨，以“立言、立功、立德”为法门的独特的人生哲学及其具体的实践方法。他们在有生之年，实实在在地建功立业，以此来解决人类的生死大事，追求着人的生命中形而上的价值，达到“祈天永命”的目的。正因为如此，周太谷虽宗儒学，却不象当时大部分的迂儒那样，皓首穷经，沉溺八股，只为达到官场中的自我实现

或不切实际的自我安慰，而是孜孜追求，传道不已，医治人疾，赈济灾民，在有限的一生中，为社会、为人类作出了有益的奉献。

第三，《周氏遗书》除了解说《周易》外，又旁释群经，所言亦“发往圣所未发，释先儒所未释。”（《龙川先生年谱》）例如：释《论语》则曰：“仲尼论性与天道也，渊乎义。……始言学而终言命，其意微。帝犹病者二，二王不足者三，故道大。所谓仁者得一言而近知，知者得一言而近仁，愚者闻而愤，不肖者见之惭。其间含章众理，犹天地包蕴万物也。”（卷九）说《孟子》则云：“天地间浩然之气，无《孟子》直养奚知？”（卷九）注《中庸》则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曰中者，一身之精气盎于背也；和者，一身之精气见于面也。失中则性命莫位，失和则百体莫育也。”（卷三）又说：“中也者，心之体也。有一伪，则弗能谓之中矣。庸也者，心之用也。有一伪，则弗能谓之庸矣。”（卷九）析《大学》则曰：“《大学》之道，忠恕而已矣，孝弟而已矣。……人视孝弟难，予视孝弟易，其故何也？入以诚，出以诚也。人视忠恕易，予视忠恕难，其何故也？立则难于知礼，达则难于知言也。”（卷九）授《春秋内传》则道：“天譬命之王，命譬性之王，性譬心之王。心与肺、肾、肝、脾譬王伯，胆譬伯之大夫，膈内譬畿，膈外譬甸，胃与百八十一体，譬四海之侯封。”（卷三）周太谷就是这样从群经讲“外王”的词句中抉择阐发出讲“内圣”的一面，说明了儒家经典是“内圣”与“外王”的统一。所以，韩仰瑜说：“循太谷之言而习之，或三年，或期月，内可翼圣，外可翼王”。（卷三）

第四，《周氏遗书》卷四《进学解》自述了问学的途径及学术渊源。如《进学解·曲阜节第四》曰：“曲阜仲尼父出，作《春秋》，系《周易》，知至知终，肫肫如也”。《秦汉节第五》曰：“秦汉以下，人知强而天知弱也。唐晋汉周之末，天知几希熄矣。”《道州节第六》说：“道州濂溪氏《通书》作，雍之

《西铭》，豫之《易传》，继继而出，不百年而人知渐转强也；吁庆历启祜之际，天知又希几熄矣。”《道光节第七》云：“追悔幼时，嗜好金陈之艺，班马之文，青莲之诗，长门之赋，旨穷理尽性之学以为迂。”最后在《学者节第十》总结说：“学者果能循朱、张、程、周、孟、思、曾之绪，而后寻孔、颜之乐，复与几存义之德，庶不负斯进学之解云”。观其所云，确如刘大绅所赞：

“圣圣心传尽此中，百年而后见儒功。”（《儒宗心法·引言》）金天翮也称太谷的《进学解》“陈义甚高”。^⑩若以此结合周太谷一生的经历，就能很清楚地看出，其明道途径，始于佛道，终归儒学。其学术渊源，系心传孔子、颜渊、曾子、子思、孟子、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朱熹的沆乳，形成了太谷学派独特的思想体系。

第五，周太谷的一生，经历了清朝由盛转衰的过程，时值清朝的大官僚、大地主兼并土地最严重的年代。据有关材料记载，乾隆、嘉庆之际的大学士和珅占有地亩八千余顷。嘉庆年间的两江总督百龄，也“买地五千余顷”。（《东华录》卷二十）因而越来越多的农民丧失了土地。由于周太谷足迹遍布海内，饱阅了民间的疾苦，因此在《周氏遗书》中明确地提出了土地的大兼并是造成当时农民饥寒交迫的最主要原因。他说：“古者什一而助。今也或四十一助，或三十一助，而农反困，何也？昔者农受田于国，今也受田于人。人或四十、三十而一助于国，农什五助于人，夫焉有不困！”（卷五）并大胆提出：“君者，均也。”（卷三）在水灾之年，周太谷嘱其子少谷曰：“君子以仁为富，不以田为富。斯岁也，数诸往未闻斯水之甚也，浸者六、七，饥有八、九。女归，将郭外之田析其一以存祭，推其九以周乡党之急，女毋吝。”（卷七）“壬辰（道光十二年，即太谷逝世之年）春，民饥，间日赈，盖食者以万数”。（张积中《张氏遗书》上）可见他关心人民的疾苦。

三、《周氏遗书》抄本概况

流传于太谷学派内部的《周氏遗书》有“北本”和“南本”两个抄本系统。旧说“北本”系张积中在山东黄崖山讲学时所辑。谢逢源《龙川夫子年谱·咸丰十年》记载：“初太谷葬事毕，大竹（汪全泰）往池州检点藏书败簏，得遗稿百余纸，阅之乃遗经也。残缺失次，因汇而辑之。后张先生（张积中）奉经往山左，存于南方者唯易、史、论语三种。师（李光炘）于是年二月朔，命逢源敬录藏之”。又，张积中《白石山房遗集续编·〈十三经或问〉告成祭文》中：“乃检《或问》（即《周氏遗书》），恪遵遗训，昼夜校定，以迄于成功。”由此推知，《周氏遗书》当为汪全泰所汇辑，张积中奉往山东校定，是为“北本”，而由李光炘在泰州命谢逢源“敬录藏之”者为“南本”。其“北本”，在“黄崖教案”时，焚毁殆尽。其“南本”，刘蕙孙教授曾告诉笔者，据他已故的继祖母郑夫人（即刘鹗的继室郑安香）说，李龙川在世时，仅缮十二部，黄葆年、蒋文田、刘鹗、谢逢源等龙川十二大弟子人手一部，皆黄绫面盈尺巨帙，爱莲堂六行毛边纸格稿精钞，线装十册（一卷一册），并统一用楠木书箱贮之。刘鹗逝世后，郑夫人于1935年由苏州移居天津刘鹗四子刘大绅家就养时，随带了刘鹗生前一直珍藏在身边的《周氏遗书》抄本，后交给刘大绅保存。1941年初，刘蕙孙教授在北京按其父所保存的原本爱莲居稿纸款式缩印了一些稿子，以同一的行款亲手又校抄了一部，今此抄本尚存刘家中。1950年，刘大绅随带刘鹗原藏本回苏州，复由苏州至杭州。1954年，刘大绅病卒杭州，刘鹗原藏本遂存刘初容（刘大绅长女）处。1972年，正值“文革”浩劫，典籍厄难，刘初容之子朱松龄为保存文献，遂将祖传的刘鹗原藏本捐赠给了浙江省图书馆（未包括书箱）。这是笔者所知的现存最早的一部龙川弟子原抄本。

另外，刘蕙孙教授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北京琉璃厂书肆曾出现一部《周氏遗书》抄本。据书贾云此抄系由杨蔚霞（字士晟，亦太谷学派弟子）之侄杨毓璜家散出。杨毓璜在山东军阀张宗昌部下任职时，死于与刘珍年的战役中，家中长物遂由其家人售出。此抄当时书贾索价一千元，刘大绅得知后，即请居京的归群弟子谢雁臣（字鸿宾）购存。刘蕙孙教授曾以“刘家本”与之相校对，两本的内容、卷数、尺寸、装帧、行款均相同，只笔迹略异，“杨家本”纸色稍旧，且多朱笔圈点。刘大绅和谢雁臣等曾疑此抄属“北本”系统，惟证据不足，亦未敢最后断定。时至今日，此抄本下落不明。

1924年至1934年，归群弟子张德广在苏州归群草堂内以雇请学派弟子辑抄学派遗书为事。先后辑成了《归群宝籍》正续编，凡九十种三百零七卷，典藏于草堂内，其中第一种即《周氏遗书》十卷。抗战爆发时，张德广已逝世，当时主讲归群草堂的黄葆年次子黄寿彭（字仲素）避难泰州，随身带了包括《周氏遗书》抄本在内的部分学派遗书。此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泰州的太谷学派弟子及其后裔，亦谨守师规家训，所藏遗书不示外人。1986年，江苏省泰州市图书馆发掘辑成了《新泰州学案资料》（即太谷学派遗书，以下简称“泰州本”）三辑二十六种，且以蓝格半叶十行毛边纸按原书款式精钞数部行世，此为研究太谷学派的学者打开了一片新的视野。“泰州本”《周氏遗书》末附萧齐先生辑后语：“先君子仲肃公（原名萧然，字自如，后改名恭，字仲肃。归群弟子）所手录（指《周氏遗书》），于大动乱中被抄没。甲子（1984）春，发还时仅查得九册，阙失卷六一册，又卷五中被撕去三页，有待补正。……次年（1986年）夏初，得同里王乐天女史之助，借得前阙之本，足成之。”从上述太谷学派的师承源流来看，“泰州本”与“刘家本”一样，均属于“南本”系统。

注:

①参见拙文《太谷学派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载《哲学动态》1989年第10期。

②⑦黄葆年《黄氏遗书》卷一。

③载《白石山房遗集续编》。

④⑤《周氏遗书》卷四《进学解·嘉庆节第八》、《戊午节第九》。

⑥⑪金天翮《皖志列传稿》卷六《周穀传》。

⑧《周氏遗书》卷二《韩仰瑜跋》。

⑨刘蕙孙教授的祖父刘鹗是太谷学派二传李光炘的高足，父亲刘大绅是太谷学派三传黄葆年的高足，因自幼趋庭所得，又数十年研读学派遗书，所以对太谷之学颇多发明。凡本文所引用的刘蕙孙教授研究成果，未注明书面出处者，皆刘蕙孙教授面告赐教。谨志谢忱。

⑩刘厚滋（字蕙孙）《张石琴与太谷学派》，《辅仁学志》第九卷第一期。

作者工作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

顾瞻稿本《说文解字镜》

北京图书馆藏有云间顾瞻（字钦阮，号雁荡山人。生卒年不详）稿本《说文解字镜》三十卷十二册。此稿本以明刻《说文解字五音韵谱》（宋李焘撰）为底本，用硃、墨笔在字侧、行间、天头等处做圈点、增删、眉批，并在卷端处圈改书名，使之成为一部以明刻做底本的新著。

《说文解字镜》未见刻本。书名叶有无名氏用墨笔题：

云间顾钦阮原本 增订说文解字镜 云石斋收藏

并钤“青霞书屋”、“云台山房收藏”、“云石斋印”印三方。序文卷端分别钤“学部图书之印”、“京师图书馆藏书”、“泽生藏金石书画印”、“孙起祺印”、“振公氏”、“章光泽印”、“西邨”印七方。每卷卷端均钤“涵斋”、“章光泽印”、“西邨”、“石可”、“得知千载外正赖古人书”印，并有墨笔题“雁荡山人顾瞻钦阮氏辑注”清秀小字一行。

•寒冬虹•